

如何測量扶手的高度

——友善平權資源箱開發後記

文、圖／陳榕笙 台灣文學創作者協會秘書長

文學是甚麼？也許是同理心的初衷。文化平權如斯貼近文學本質，執行文化平權微電影的拍攝和製作，除了要具備文化知識之外，更需要明確的工作流程管控，拍攝過程令人回味無窮。

之一·如何測量扶手的高度

不久前，我經過館內一樓大廳電梯旁，瞥見年輕學子三人，擊著皮尺、筆記本與手機，正在測量無障礙坡道不銹鋼扶手的高度。

好奇心噴發的我，忍不住湊上前探問：「嘿，請問妳們在做什麼？」

「喔……」可能是突然被奇怪大叔搭話，三位女學生有點驚慌，其中一人答曰：「老師叫我們量的。」

「老師？」我更好奇了。

「我們是室內設計系的學生，老師叫我們來量尺寸。」

我恍然大悟：「原來是學校作業！」

接著，基於小說寫作者的本能，我更好奇這是什麼樣的作業：「老師要妳們測量公共空間的無障礙設計，對吧？」

「不是……」

「是考究無障礙坡道的斜度或扶手高度是否適宜嗎？」讀過幾篇無障礙公共設計文章，我篤定地問。

「也不是耶……」學生一臉懵懂。

「要不是什麼？」我突然有點困窘，好像是自己多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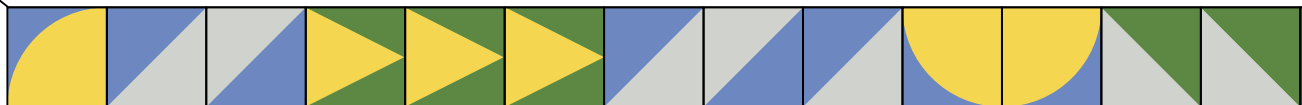
學生似乎也有點困惑：「真的沒什麼，老師就只是教我們丈量各種桌椅扶手的高度跟尺寸回去而已，沒有說為什麼……像這個也要量啊……」學生繼續量著旁邊的公共座椅、階梯的高度、走廊的寬度。

量測扶手的高度，看起來是多麼單純的動作：同學拉開皮尺丈量，報告數據，一下子便完成功課，收拾東西離開了。留下呆然的我，像隻離群仍假裝警戒的狐獴一樣佇立，只剩滿臉黑眼圈與問號。

等等……學生真的了解到，她們量測的這些數據，有什麼意義嗎？

如果不知為何而量，那麼，扶手高度又有何意義？

我意識到自己的困窘，來自於一種「想得太多」的狀態：是啊，別人只是單純量測尺寸而已，為什麼我非得要考量到無障礙設計層面呢？如果是尚未來到館內參與「友善多元社群學習計畫」的我，也許根本不會意識到學生丈量扶手的行為，有



什麼更進一層的意義或用途。

這也許就是所謂的「平權意識」吧？

當我進入陌生的公共場所，會先注意到他們的動線、電梯與無障礙設施……注意到他們為了盲人或聾人多做的一點巧思；住旅館時，對於設計家具沒有多少讚譽，反而對於幼齡孩童的碰撞高度或洗手檯高度相當在意；參加活動或展覽時，看到老人吃力跟著排隊的長龍行走時，就忍不住想找工作人員來問問：能不能借張椅子？這些善意的念想以前也會有，但是當它成為工作上的基本意識反應時，我才了解到這樣的「平權意識」有多重要。

許多年來，像我這樣閒散的創作者心中，總梗塞著一個大哉問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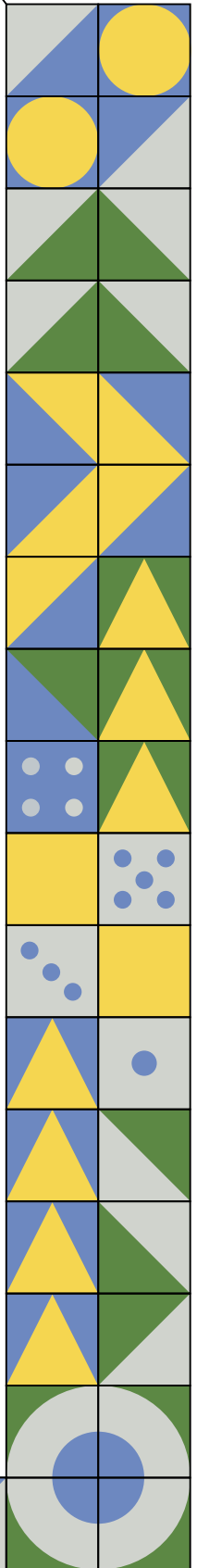
什麼是「文學」？

「文學」是人類透過主觀思考與文字呈現，對於社會現象及個人情感的省察，它有很大的比重是一種接近「同理心」的情感所構成的初衷；它揭櫫一種可能性：透過閱讀的情感同理，人類能夠在某種意義上達到「平等」的大同境界，不論貧富或身心障礙，任何人能透過文學，體驗另一種生命歷程的感受與體悟。

「文學」跟「平權」乍看沒有關聯，其實「同理心」就是兩者的共通點，小說家筆下的人生百態，人生充盈著名為不公平的反物質，撐起萬物，以及一股名為「公理」的普世價值。

什麼是文學？文學就是同理與平權。我日日夜夜擔憂自己沒有去思考背後的意義，追求文學技巧好像就會淪為量測扶手高度這麼制式化的工作。為此，我得到胃食道逆流、慢性支氣管炎以及腕關節症候群這些寫作者的常見患疾，但卻換得了一份領悟：重點不是如何測量扶手的高度，而是搞懂為什麼要做這件事。

搞文學的人，重點不是如何寫出永垂不朽的作品，而是釐清自己為何而寫。



恍惚之間，這份體會與我幾年前，從純文學小說轉向兒少小說寫作的初衷，竟然隱隱呼應。

之二 · 為何要拍微電影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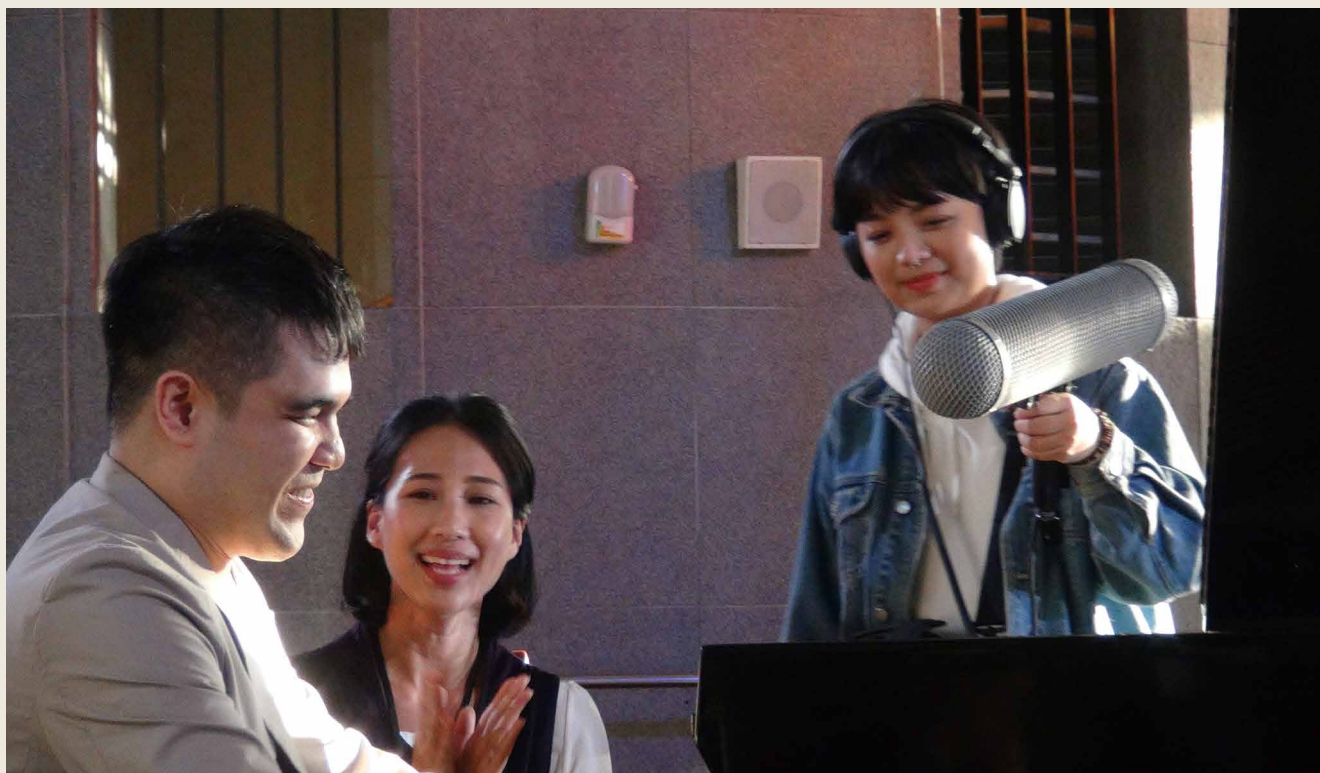
107 年度的友善多元社群學習計畫，其中規劃三款資源箱的製作以及一場發表記者會，三款資源箱分別以「聽障」、「視障」以及「兒少」三大族群為主題，也就是說，沒有人要我們拍微電影，是自己私心想拍的。

我在某個場合問了一位文學導師，有沒有興趣來拍這部微電影？當時老師也在文學影像領域小有名氣，老師很阿沙力地開了一個超友誼價的製作數字，並預劃一個極精簡的製作時程，但在那當下我心裡很惶恐：真的有這麼順利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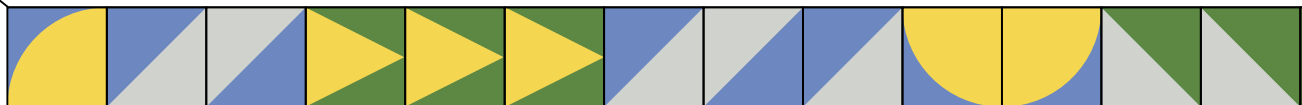
最終我們沒有合作，雖然我心裡有點過意不去，但這一切似乎太簡單了！多年來沒有穩定收入的跌宕人生讓我體悟一道鐵則：一旦事情看起來好像十拿九穩，最終做出來的東西便會一敗塗地。

串起三大友善族群議題，如此重要的微電影，最後我找了一位剛退伍的替代役男來拍。

剛認識阿堯時，他還只是館內文化替代役，穿著超矮的土黃色制服，屈身在兒童書房裡的低矮櫃台當中，做一些搬書打雜的工作，支援剪接活動成果報告影片，但實際上他已經有多年的影像製作經驗了，他這樣年紀輕輕就能擔負紀錄片監製與扛起一家電影公司運作，我真心感受到臺文館對他的仁厚，如果我是他的主管或長官，一定惡狠狠毫不留情的壓榨他的才華。



友善平權微電影現場劇照。



突破同溫層 文學新感受

—— 走讀、桌遊、遊戲與體驗



微電影拍攝出外景。

我和阿堯聊起影像敘事一見如故，但提到這個案子，他面有難色，好像我擺明要凹他一樣。他看起來有點不可靠，可是這反而是我下定決心與他合作的開始。在這邊當了一年多的替代役，阿堯成了半個博物館員，也是絕佳人選。

他帶我到 B1 圖書室的中庭，那兒有處小小的天井，陽光從上方漏下，遍灑天井週邊擺放的形形色色盆栽；天井中央有一座仿金字塔的透光窗，看起來就像微型的羅浮宮金字塔造型，這裡是阿堯的秘密基地，當兵難以戒絕的摸魚習性，他如數家珍的介紹這些盆栽，都是清潔阿姨收集各活動的單位贈花，悉心照料而活得朝氣滿滿。我跟阿堯站在這裡討論出微電影劇本的雛形，伊娜就從某個角落裡走出來，好奇地打量我們。

其後，開始拍攝才發現：電影工作果然是一首自虐的詩。沒有一件事順利卻能讓一群人迷醉其中；除了黃裕翔的檔期非常難敲定之外，舉凡劇本、拍攝許可、拍攝日期與場地的種種困難，毫無例外地一一找上劇組。

直到拍攝當天，一大早到了現場，我才發現：劇組人員完全不受控，連阿堯也不太聽我講話，自顧自的拿起相機側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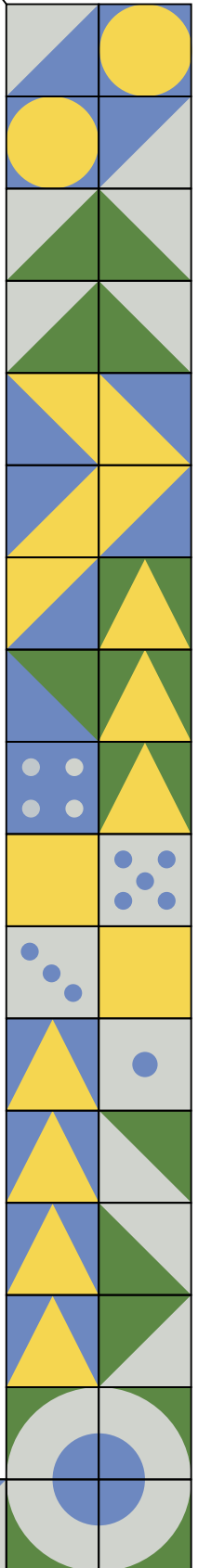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件麻煩事，就從劇組拿出梯子開始。

女主角伊娜的設定，是一位安靜的聽障女孩，身上背著沉重的收音設備，來為他的爺爺採集早年記憶裡文學館的聲音。當時我們曾經為了她如何進入休館日的文學館而爭論不休，你也知道的：公部門怎麼可以鼓勵大家隨隨便便就架個梯子破窗而入呢？

「可是這樣就沒有戲劇效果了！」阿堯斬釘截鐵的告訴我。

我們設想過各種劇本上的開脫方法，包括問路、借廁所、趁雪芙瑞補貨時偷偷溜進來，但劇組還是很歡樂地搬出了樓梯。

「老師沒關係，我們先拍攝嘛！如果館方有意見，我們再剪掉就好



啦！」阿堯半哄半騙的試圖拖延時間，讓劇組拍完這個鏡頭。

拍完了爬牆，接下來拍攝開窗。這部分也是我極力勸阻的一部分，文物需要恆溫及濕度控制的環境，因此博物館的窗戶不能隨便打開；阿堯嘻皮笑臉地說：「老師沒關係，我看清潔阿姨她們也都會打開通風一下呀！」至此我已然放棄，劇組則歡天喜地的丟掉手上的分鏡腳本，以某種我所無法參透的群體意識，速度飛快地拍攝每個預設或即興的場景。

而事實上，「打開窗」這件事似同「友善平權」的相近意義，都是在墨守陳規的體制內試圖找出一條向外呼吸的管道，讓貴重而極具文化價值的藏品能夠以新型態的敘事型態，呈現在新一代眼前，喚醒他們的關注。



拍攝微電影彈奏現場，光線多彩繽紛。



劇組為展場開窗。

故宮的街舞影片中，讓高中生在國寶旁breaking，兩廳院的廳堂也能成為年輕學子與專業舞者交流的場域，我想也是一種新世代與不同型態的藝術文化交流；微電影殺青後，我深深地喜愛上這部影像作品所要傳達的意象：除了友善平權、除了音樂與影像之美，這部微電影清楚地傳達出一種自信，大聲地疾呼同理而不同情的宣示……不信？請重新再「看」一次影片，戴上耳機，全程閉上眼睛，你會發現除了劇情無礙之外，「文學館之聲」這個隱藏的角色也出現了：車聲、廊道回音、窗戶裡的平衡錘、轉動門把的機樞聲、附近馬雅各教會的鐘聲……這些元素構築了視障者解讀影像的可能性，也同時提醒著明眼人容易忽略的細節。

打開一扇窗，照見平權的亮光，讓不同的族群、聲音與能量一同參與，這便是臺文館友善平權資源箱的初衷。而帶著一點浪漫色彩的影像敘事，總是能受到人們青睞，這也是「為何拍攝微電影」的最大理由：「故事」總是能比「人」跑得更遠、流傳更廣……期待這三款資源箱在未來的推廣之路，如同一場無畏的旅行，能夠遇見更多平權夥伴的感人故事。✎

